

【思想文化研究】

# 《吕冠子》的政治态度

商原李刚

(长安大学 人文社科部, 陕西 西安 710064)

**摘要:**《吕冠子》是战国末期道家人物吕冠子及其学派的文章汇编。它的内容虽然复杂,广泛地吸取了仁义礼法等思想,但道家的无为自治和道治倾向是主要的,其政治态度和社会理想主要是自然主义的。在严酷的政治现实面前,《吕冠子》表现出了两难的政治选择。

**关键词:**《吕冠子》; 政治态度; 道家; 无为; 自然主义

**中图分类号:** B2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2)02-0014-04

## On the Political Attitude of the Book of He Guan Zi

SHANGYUAN Li-gang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China)

**Abstract** The Book of *He Guan Zi* is the corpus of treatise written by *He Guan Zi* and his doctrine that belonged to the Daoist school in the last stage of the Warring States. Although it has complex contents and widely absorbed the thoughts of benevolence, righteousness, rite, law, etc. its main political inclination is governing by Dao and doing nothing that goes against nature, its political attitude and social ideal is mainly naturalism. *He Guan Zi's* political choice is very difficulty before the harsh political reality.

**Key words** *He Guan Zi*; political attitude; the Daoist school; governing by doing nothing that goes against nature; naturalism

### 一、吕冠子其人其书

唐代柳宗元作《辨吕冠子》以后,学者多以《吕冠子》为伪书,很少有人再去重视它,思想史和哲学史著作也很少提及。马王堆帛书出土以后,发现《吕冠子》不少语句与帛书相同,才引发人们再次思考此书的可信性和价值。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吕冠子》一篇,楚人居深山,以吕为冠。”<sup>[1]</sup>应劭《风俗通义》曰:“吕冠氏,楚贤人,以吕为冠,因氏焉。”<sup>[2]</sup>吕是古书上说的一种善斗的鸟。《后汉书·舆服志》说:“吕,雄雉,为武冠。”<sup>[3]</sup>《太平御览·逸民》引《高士传》说:“吕冠子,或曰楚人,隐居幽山,衣弊履穿,以吕为冠,莫测其名,因服成号,著书言道家事焉。(庞)援常师事之。援后显赵,吕冠子惧其荐己也,乃与援绝。”由此可见,吕冠子

很可能是楚地学者,庞援(即庞煊)的老师。李学勤据《吕冠子》的《世兵篇》提到燕将剧辛和《武灵王篇》提及庞煊,推定:“吕冠子的活动年代大约相当赵武灵王后期至赵惠文王的时期,即公元前310年至260年,这样庞煊和庞煊才能都和他往来。至于《吕冠子》的写定,自在杀剧辛之后。吴世拱云:‘本书凡称‘庞子’者,当出于庞煊弟子之手。……其时间当在战国末以至汉初。吕冠子是楚人,庞煊也有人推为楚人。通观全书,其语言特点是楚地的,所以他们实际上是楚国的一个道家学派。”<sup>[4]</sup>孙以楷、陈广忠等的新著《道家文化寻根——安徽两淮道家九子研究》认为吕冠子很可能是西楚淮南人。他们把李学勤、唐兰、吴光、谭家健、黄钊等的观点总结成这样几个方面来论证这一观点:第一,《吕冠子》的《王铁》篇记述了八种官职,其中四种属楚制,秦制、齐制各两种,可见,作者最熟悉楚制,很可能是楚人;第二,李学勤、唐兰等发现《吕冠

收稿日期: 2002-01-08

作者简介: 商原李刚(1967-),男,陕西商州人,长安大学人文社科部副教授,博士,从事中国思想史和认识论研究。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子》与《黄老帛书》20多处文字相同或相近,其作者很可能是西楚淮南人;第三,从元气论来看,《鹖冠子》的元气论源于《庄子》;第四,从庞煖杀剧辛一事看,庞煖到赵国当在公元前243、242年左右,鹖冠子当为西楚人;第五,1982年绍兴发现徐国铜器,其汤鼎上铭文的用韵与《鹖冠子》一致,董楚平据此断定其作者很可能是淮河流域徐人后裔;第六,孙以楷、陈广忠等从恋鸟情结,补证鹖冠子为淮河流域的淮夷之后,并从鹖冠子与庞煖的关系推断鹖冠子大约生于公元前300年~公元前290年,卒于公元前220年前后<sup>[5]</sup>。这些论证是很有说服力的。

《鹖冠子》一书,《汉书·艺文志》记载有一篇,至《隋书·经籍志》为三篇,《唐书》、《宋书》沿之。唐代韩愈作《读<鹖冠子>》,说只有十六篇<sup>[6]</sup>。宋《四库书目》记载有36篇。篇、卷的数目差别很大。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今书乃八卷,前三卷十三篇,与今所传《墨子》书同;中三卷十九篇,愈所称两篇皆在,宗元非之者,篇名《也兵》,亦在;后两卷有十九篇,多称引汉以后事,皆后人杂乱附益之。今删去前后五卷,止存十九篇,庶得其真。”现存的陆佃注本《鹖冠子》正是十九篇。清人王闿运认为:“道家《鹖冠子》一篇,纵横家《庞煖》二篇。《隋志》道家有《鹖冠子》三卷,无《庞煖》书,而篇卷适相合。隋以前误合之。”张岱年《中国哲学史科学》认为今本可能是把《汉书·艺文志》中道家和兵家的《鹖冠子》合编而成的<sup>[7]</sup>。吕思勉说:“盖庞子赵将,而《鹖冠子》则庞子之师,此其所以误合也。此书义精文古,决非后世所能伪为。”<sup>[8]</sup>吕思勉的这一说法,是富有预见性的,《鹖冠子》的确是马王堆帛书为同一类的荆楚学者之言。柳宗元怀疑《鹖冠子》是伪书的理由有两条:一是认为该书“尽鄙浅言也”;二是引用同样的一句话,司马迁首先提及的出处是贾谊而不是鹖冠子<sup>[9]</sup>。其实,柳宗元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第一,并非先秦之书不能有浅鄙之言;第二,司马迁的引用,与其他人一样,不过是偶随所见而已。所以,柳宗元的说法是靠不住的,《鹖冠子》一书当为鹖冠子及其后学的著作,成书于战国末年到汉初。

## 二、《鹖冠子》的自然主义政治态度和信仰

《鹖冠子》一书,虽然内容并不完全一致,但大体能反映一位楚地学者的道治主义政治文化和态度。全书所谈论的主要是政治和军事问题。比利时学者戴卡琳在其所著的《解读<鹖冠子>》一书中

认为:“《鹖冠子》十九篇,在篇幅和清晰度上大不相同,由零散的格言、故事以及精心结构的论辩组成,主要涉及政治和军事事务,医学的类比,天文的想象以及历史的事例,全都是用作劝说君主的材料。”<sup>[10]</sup>这一概括是非常准确的。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一场类似于“从身分到契约”的社会解放运动,士这一特殊的社会阶层获得了广泛而优越的参政机会;“学而优则仕”是士的主要选择。因此,先秦诸子著书立说,多是为统治者提供政治哲学和合理化建议,《鹖冠子》也不例外。从先秦“议者”与“治者”的关系来看,“议者”往往采取了“和而不同”的态度,合则兼济天下,不合则隐居山林,不愿委曲求全。鹖冠子虽隐居以求其志,但胸怀救世之心,与庄子的逍遥游不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黄老道家政治文化。他立足于楚文化和道家思想,崇尚天地自然,主张无为政治,并以此为政治成败的原则。在战国末年这一特殊背景下,他又以开放的心胸,撮百家之要,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自然主义政治信仰。

《鹖冠子》的政治理念与他的道论有直接的关系。他直接继承了《老子》的道论和《庄子》的气论,但仍然以道为天地的本原。在《老子》中,道具有三方面的规定:一是本体,二是本源,三是规律。南方道家特别是《庄子》开始尝试着把道描述为天地万物的本源,但道仍然是本体和规律。《鹖冠子》继承了《庄子》开创的传统,一方面坚持老子的“道法自然”的自然主义原则:“随而不见其后,迎而不见其首,成功遂事,莫知其状,图弗能载,名弗能举,强为之说曰:苒乎芒乎,中有象乎?芒乎苒乎,中有物乎?窅乎冥乎,中有精乎?致信究情,复反无貌,鬼不能见,不能为人业。故圣人贵夜行”(《夜行》)<sup>[11]</sup>。《鹖冠子》高扬的是《老子》的“道法自然”的旗帜,突现了道的“不见其事而见其功”<sup>[11]</sup>的神奇作用。因此,它把自然作为理想社会的最高标准。但另一方面,《鹖冠子》从元气论出发重点发挥了作为规律的道:“有一而有气,有气而有意,有意而有图,有图而有形,有形而有事,有事而有约,约决而时生,时立而物生。故气相加而为时,约相加而为期,期相加而为功,功相加而为得失,得失相加而为吉凶,万物相加而为胜败。莫不发于气,通于道,约于事,正于时,离于名,成于法者也”(《环流》)<sup>[11]</sup>。这一理性主义的解释,赋予道以自然规律的意义,通过气为道和法之间架设了桥梁,使道从气到事到时到名一直到法,并明确得出“道生法”(《兵政》)<sup>[11]</sup>的结论。“气”使《鹖冠子》更加现实化。“阴阳”观念,也可能受到

《国语·越语》中范蠡的影响,使其自然、无为思想与战国的政治、军事完全结合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理想社会的蓝图。在《度万》中,鹞冠子提出了“五正”：“庞子曰：‘敢问五正？’鹞冠子曰：‘有神化，有官治，有教治，有因治，有事治’”（《度万》）<sup>[11]</sup>。“帝制神化，治之期也”（《泰录》）<sup>[11]</sup>。由此可见，鹞冠子所重视的是自然主义的理想社会。

鹞冠子毕竟生活在战火连天的战国末年。作为道家人物，要么彻底追求逍遥，要么有所作为。他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加强君主的权力和军事实力，才能实现天下统一：“一人唱而万人和，如体之从心，此政之期也”（《天则》）<sup>[11]</sup>。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这一点是黄老道家和其他学派及其时代的共识。但是，现实中的君主往往以贵为道，以意为法，明者少而暗者多：“时君遇人有德，君子至门，不言而信，万民亲附；遇人暴骄，万民流离，上下相疑，复而如环，日夜相绕，谏者弗受，言者危身，无从闻过。故大臣伪而不忠”（《道端》）<sup>[11]</sup>。作为道家人物，鹞冠子对战国末年惨烈的现实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过生于上，祸生于下，浊世之所以为俗也，一人乎！一人乎！命之所极也”（《鹞冠子·天则》）<sup>[12]</sup>。痛惜之辞，溢于言表。类似的话，书中出现过多次。统治者的暴骄，是万民的祸根。因此，他认为，“夫寒温之变，非一精之所化也，天下之事，非一人之所能独知也，海水广大，非独仰一川之流也。是以明主之治节也，急于求人，弗独为也……事不事贤，无功必败……是以先王置士也，举贤用能，无阿于世”（《道端》）<sup>[11]</sup>。统治者一人之智，不能知天下之事，更何况暗弱之君。因此，必须“举贤用能”，方可治乱。一方面，“君也者，端神明者也。神明者，以人为本者也。人者，以圣贤为本者也。圣贤者，以博选为本者也。博选者，以五至为本者也。”“君以人为本”（《博选》）<sup>[11]</sup>，这是道家的人本主义。在人之中，又须以圣贤为本，用“五至”的标准，选拔隽者、豪者、英者。另一方面，尽管“本出一人，故谓之天”（《道端》）<sup>[12]</sup>。但“循度以断，天之节也”（《天则》）<sup>[11]</sup>。而且，“已见天之所以信于物矣，未见人之信于物也。捐物任势者，天也。故莫能宰而不关。夫物故曲可改，人可使。法章物而不自许者，天之道也”（《天则》）<sup>[11]</sup>。他不满于祸国殃民的“时君”，希望有听微决疑的圣王，来挽救世道。但又觉得单有圣王尚为不足，还须任贤举贤，又因时为法，才能有清明之治。对政治权威及其作为，道家历来持怀疑和否定态度，鹞冠子也不例外。因此，他一方面寄希望

于明主贤臣，但同时也看到了人的不可靠，即“未见人之所信于物也”（《鹞冠子·天则》）<sup>[11]</sup>，主张“捐物任势”，“一为之法，一成其业”（《环流》）<sup>[11]</sup>。用法来限制人君的任意性，做到人情与理法相结合，以保证社会的健康发展。鹞冠子虽然主张法制度而治，但他并不崇拜法：一方面，他主张：“生法者，我也；成法者，彼也”（《环流》）<sup>[11]</sup>。另一方面，他清醒地看到：“苟精牧神，分官成章，教苦利远，法制生焉。法者使去私就公，同知壹敬，有同由也，非行私而人合同者也。故至治者弗由，而名尸公伯”（《王铎》）<sup>[11]</sup>。可以看出，鹞冠子一方面崇拜君主集权，另一方面又不信任君主的德行而主张任用贤能；一方面推崇法制，另一方面又认为法制只是下策。他的这种矛盾心理，正是在无奈之时委屈求全的结果。

鹞冠子对现行政权及其政治人物充满疑虑，但对民众的生活却充满了同情。与道家其他人物一样，他也希望为政者给民众宽松的生存空间，希望民众能自救自助。但他也清醒地看到，普通的民众是政治生活的弱者，在政治上也不会有什么作为。因此，“人者，以圣贤为本者也”（《博选》）<sup>[11]</sup>。但并非随便什么圣贤都能关心民生疾苦。因此，“圣贤者，以五至为本者也”（《博选》）<sup>[11]</sup>。根据“王铎”，依据不同的能力，选出隽、豪、英，作为政治楷模，达到“乡曲慕义，化坐自端”的无为而治，即“神化者，定天地，豫四时，拔阴阳，移寒暑，万类成全，名尸气皇。官治者，师阴阳，应将然，地宁天澄，众美旧焉，名尸神明”（《度万》）<sup>[11]</sup>。面对时君的暴骄，他只好让步，提出“事治”方案，以迁就现实需要。但在他心中，仍然悬着一个“帝制神化”的社会政治理想。道家政治态度的现实化，并非完全庸俗化。道家的社会批判精神和独立人格，在现实压力面前，是逐步改变的。对人民的同情，与对儒家思想感情的吸收是分不开的：“夫仁者，君之操也；义者，君之行也；忠者，君之政也；信者，君之敬也”（《道端》）<sup>[11]</sup>。鹞冠子虽重视军事，但他却从儒家的角度加以理解：“兵者，礼义忠信也”（《近迭》）<sup>[11]</sup>。在他看来：“王铎非一世之器者，厚德隆俊也”（《博选》）<sup>[11]</sup>。儒家思想就是《鹞冠子》一元多维的自然主义信仰的重要一维。

鹞冠子对战国政治的评价，还体现在他的社会理想中。他认为，“上不加务而民自尽，此化之期”（《天则》）<sup>[11]</sup>。“使百姓释已而以上为心者，教之所期也”（《天则》）<sup>[11]</sup>。“寒者得衣，饥者得食，冤者得理，劳者得息，圣人之能”（《天则》）<sup>[11]</sup>。政、教、化、

圣的目标,正是一种道家的无为之境。不过,它同时吸纳了儒家的无为之道。所以,《鹖冠子》说:“泰一者,和大同之制,调泰鸿之气,正神明之位者也”(《泰鸿》)<sup>[11]</sup>。“泰一者”的内圣外王之道,正是“大同之制”。道家与儒家,“大同”之见略同。比起道家的前辈,鹖冠子给“因”以规律的意义;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因治”即“因民之俗”并非政治的理想境界。他的这种矛盾心理,正是一种无可奈何之情的表现。

### 三、《鹖冠子》的两难政治选择

鹖冠子对自己的政治作为又是怎么看的呢?《太平御览》说他惧其(庞媛)荐己,乃与援绝。可见他与当局的不合作是很坚决的。但一个“慎”字,更能说明他的真实态度。《著希》说:“贤者之于乱世也,绝豫而无由通,异类而无以告,苦乎哉!贤人之潜乱世也,上有随君,下无直辞,君有骄行,民多谗言。故人乘其诚能,士隐其实情。心虽不悦,弗敢不誉;事虽弗善,不敢不力;趋舍虽不合,不敢不从。故观贤人之于乱世也,其慎勿以为定情也”(《著希》)<sup>[11]</sup>。贤者于世,敢怒而不敢言,只得委屈求全,逢场作戏,其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韩愈说:“其《博选》篇‘四稽’、‘五至’之说,当矣。使人遇其时,援其道,而施以国家,功德岂少哉!”(陆佃《鹖冠子注》)<sup>[11]</sup>宋人高似孙在《子略》中对此作了详细的说明:“春秋战国间,人才之伟且多,有不可胜者,不得其时,不得其位,不得其志,退而藏之山谷林莽之间,无所泄其谋虑智勇,大抵见其论著。然其经营驰骋天下之志,未始一日忘,而其志亦可窥见其万一矣。是以功名之念有一怵其心,利害之心有一荡其虑,而独立特行之操,不足以尽洗见闻之陋也。是其为书不出于黄老,则杂于刑名,是盖非一《鹖冠子》而已也。”<sup>[12]</sup>这一说法基本上是合适的:第一,说鹖冠子不得其时,不得其位,不得其志,退而藏诸山谷林莽之间,与班固等人的说法相符,且与《鹖冠子》中的道治思想是相近的。《鹖冠子》的政治见解虽为无为之道,但积极救世的民本情怀溢于言表;从它所提供的治世之策来看,基本上是从现实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并未止于抽象的政治原则和说教。鹖是古代一种好斗的鸟,鹖冠子多少也能说明他和军事斗争的密切关系,以至有人认定他曾经做过将军。《鹖冠子》的《兵政》等篇本身就是军事

问题的专论。《鹖冠子》在制度建设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如“天曲日术”、“成鸿氏之术”、“王铎”等,显然属于黄老道家一派,与《庄子》之学不同。第二,鹖冠子之隐,正如高似孙所说,未脱利害之心。因而,在黄老道家中,他与直接参政议政的稷下黄老人物不同,但也与半隐退、半参政的文子很不相同。体现在理论上,《鹖冠子》更接近“杂家”,儒法刑名以及术数兼而有之。由此可以推断,他已接近于汉代的陈平之类的道家人物,离参预现实只有半步之遥。问题只是在于:他面对的“时君”,多是无法实现无为之道的人物,即使百般迁就,也难如人意。有了这些经历之后,他很可能坚决拒绝别人的推荐。但对社会的挂念使他把精力放在了写书、育人之中,形成了在道家中也是非常独特的政治态度。

《鹖冠子》的道家思想更接近现实,但道家的无为之道对现实基本上作了否定的评价。他愤而退隐,但却在思考现实斗争和发展,且培养了参预现实的政治人物;他在无为与有为之间徘徊,但还是坚持了理想,做出了痛苦的选择,也表露了隐居的无奈。

从整体上看,《鹖冠子》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它的思想深刻丰富,它所表现的政治态度非常复杂,体现着对现实政治的深入思考和对现实去就的艰难选择,在道家政治哲学中有着非常鲜明的特点,值得进一步探讨。

#### 参考文献:

- [1]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2] 应劭.风俗通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3] 范曄.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4] 李学勤.失落的文明[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 [5] 孙以楷、陈广忠等.道家文化寻根[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
- [6] 韩愈.韩昌黎全集[M].上海:中国书店,1991.
- [7] 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科学[M].北京:三联书店,1982.
- [8]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5.
- [9] 柳宗元.柳宗元集[M].上海:中国书店,2000.
- [10] [比]比戴卡琳.解读《鹖冠子》[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 [11] 鹖冠子.鹖冠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12] 高似孙.子略[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